

被遗忘与曲解的古典中国

——《吕氏春秋》对传统学术的投诉

郭智勇 · 著

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被遗忘与曲解的古典中国

——《吕氏春秋》对传统学术的投诉

郭智勇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遗忘与曲解的古典中国:《吕氏春秋》对传统学术的投诉 / 郭智勇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495-3280-3

I. 被… II. 郭… III. ①杂家②《吕氏春秋》—研究 IV. B22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396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 421008)

开本: 710 mm × 990 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75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致读者

1

第一章 来自古典中国的抗议

1

- 一 “贵己”还是“贵己” 2
- 二 “廉”是古典中国的基本特质 17
- 三 “廉”在秦汉中国仍然是被推崇的品格 19
- 四 真正的《墨子》 24
- 五 酷吏是墨子的传人 30

第二章 义篇

39

- 一 古典中国语境中的“义” 39
- 二 “义”的内容 49
- 三 “义”的形式 69

第三章 被曲解与遗忘的古典之“士”

90

- 一 “士”——有别于“民”的精英 90
- 二 士是“义”的具体呈现 95
- 三 士与文化 98
- 四 士是主体人格 102
- 五 荣誉至上 107

第四章 阳生与“贵己”	113
一 详说“贵己”	115
二 《史记》中的“贵己”	123
三 阳生与阳庆大有关系	128
四 阳生是《墨子》的作者之一	131
五 《列子·杨朱》是后出作品	135
 第五章 《庄子》非庄子	 144
一 从字词演化规律和实例看《庄子》内篇的成书年代	148
二 梦觉皆幻	165
三 风动还是心动?	175
四 想象，还是瑜伽?!	182
 第六章 道篇	 193
一 伦理之“道”	194
二 秩序之“元”	198
三 义就是行为与“道”相符	201
四 作为方法论之“道”	202
五 从入世到出世	204
 第七章 从古典中国到传统中国	 215
一 “义”——古典中国的精神	216
二 “义”之美与“仁”之善	236
三 从古典中国走向传统中国	245

第一章

来自古典中国的抗议

[引子：在天庭太极广场上，一些心怀不满的灵魂在奔走呼号，在鸣冤叫屈。他们认为，自己在人间的言行受到了后代子孙不公正的评价，这样的“不公”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在上天的安息与修行。他们向往清明与宁静。

在这些灵魂中，两千年来一直眉头紧锁、郁郁寡欢的华夏族秦朝始皇帝嬴政近期却喜上眉梢，突现满面春风。原来，太一帝接受了他的投诉，派遣了以李开元、程步为代表的学术使者到凡间进行工作^①，这些学术家已经在凡间给这位中华文明的千古一帝掀起了一次相当有分量的平反运动。嬴政的历史地位看来很有彻底转向的可能。

与嬴政的春风满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在凡间最重要关系人和政治对手吕不韦却仍然心情沉重。尽管李、程等人间学人的工作在为嬴政恢复名誉的同时，也颇带廓清了历史强加在吕子身上的污名。现在人们都已不再相信嬴政是他的亲子，他也并没有为了当上秦国的执政使出所谓“下三滥”功夫。但是，吕子并没有比过去更开怀。他认为，嬴政的受屈，正如李开元先生所说，是儒者为彰显自己的道德高度，有意篡改历史，使后来的学人云遮雾罩之故。不过，嬴政也确实有个人缺点，而他吕子两千年来所受的骂名却比嬴政有过之而无不

^① 程步先生的系列书《真秦始皇》和李开元先生的《秦始皇的秘密》近年来很有影响，前者以价值重估为主，后者更多学术意味。

及。他知道有些事情是历史的趋向所然，花太多心思为个人的道德品质辩护实属无谓。吕子不甘心的是，他一生竭尽心力完成，且几乎完好留存于世的典籍《吕氏春秋》却毫无缘由地被他的后世子孙曲解和遗忘。两千年来他无数次到太极广场的学术宫投诉，希望太一帝能派遣使者到凡间替他拨乱反正，但总是杳无下文。看到嬴政扬眉吐气，吕子很希望能借此东风，向他的后世子孙再讲述一遍真正的《吕氏春秋》，还古典中国一个真实，还自己与同仁一个本来的“高尚”和“理性”。

在准备最新一次投诉之时，吕子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他发现，进入西元新千年之后，人间的学术已有了崭新的面貌，除了上面所说的李、程诸子外，还有一个并不知名的郭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有了深切的洞察。

吕子再次走向学术宫。他感到愉快的是，学术宫当局这次对他相当热情，并且组成了由王充、阎若璩、章太炎、胡适、顾颉刚、郭沫若、尼采、奥·斯宾格勒、黑格尔、伯特兰·罗素、卡尔·波普尔、汤因比等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进行听证。各位大师对本次投诉保持了前所未有的虚心态度，对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考察。]

吕子：各位专家，我要投诉的是传统中国的不学无术和冥顽不灵（请原谅我的直率），传统中国对我们尽心竭力完成的《吕氏春秋》充满了熟视无睹的麻木和苟且偷安的曲解。这些麻木与曲解令人无法释怀。

还是先请各位审阅一下我带来的一位默默无闻的郭生的一篇论文吧！这篇论文虽然论点过于具颠覆性，但确实是一篇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文章。

一 “贵己” 还是 “贵已”^①

——从《吕氏春秋》文本出发对战国三子思想主旨传统理解的质疑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典籍，其中包含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思想主张，这是学界的共识。《吕氏春秋》本身就专门有一段总结，《不二》篇说：

^① 本文发表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后被《人大复印资料》2008年第1期全文转载。这里有所修改。

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臧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

这十家的思想主旨到底该如何把握，两千年来已形成一种定说。由于《吕氏春秋》本身没有对这十家的详细解说，因而传统上也就基本以《孟子》、《荀子》、《韩非子》、《庄子·天下》篇对各家的描述加上高诱等的注解作为基调。应该说，这样的处理方式自有它的情理。稍感遗憾的是，既然《吕氏春秋》被赋予了“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①的历史使命，而其又被公认为先秦诸家的总集，《吕氏春秋》文本内容本身也确实涉及当时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包罗万千，那么，从《吕氏春秋》文本出发抽绎出上述各家的思想主旨，就学术而言就是责无旁贷了，特别是当《吕氏春秋》文本本身所揭示的思想取向与传统理解有明显的差异时更应这样。

通过对《吕氏春秋》文本本身的深入阅读和对该书作为一特定时代产物的关联性思考，本文认为，《吕氏春秋》中的墨子、陈骈和杨朱的思想主旨与传统的认定有相当的距离，特此提出，以期抛砖引玉，并盼专家批评指正。

（一）墨子本是贵“廉”而不是贵“兼”

对于如何治理天下，当时的“豪士”各有自己的主张。孔子重视“仁”，老子重视“柔”，关尹重视“清”，列子重视“虚”……这些都是我们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固有的。只是当我们看到“墨翟贵廉”时，心里就难免会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墨子是讲“兼爱”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墨子兼爱。”《淮南子·泛论训》说：“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今本《墨子》有《兼爱》、《尚贤》等十篇，所以世人都知道《墨子》的主旨是“兼爱”，正如梁启超先生说：“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观念出来，就是‘兼爱’。”^②

由于有了这些强有力的素材支持，所以人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廉”是“兼”的假借，正如清代名家孙诒让所说：“‘廉’疑即‘兼’之借字。”^③

“墨子贵廉”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墨子贵兼”。两千年来，国人都是这样来

① 《史记·吕不韦列传》。

② 梁启超：《墨子学案》，商务印书馆，1921年，第15页。

③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125页。

对待这个问题的。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吕氏春秋·不二》篇明明是说“墨子贵廉”，且从《吕氏春秋》有关墨子和墨者的整体语境来看，“贵廉”之概括才真正切合《吕氏春秋》中古典墨家之形象。

首先，我们来看看“廉”字的本意。“廉”，《说文》指“侧面”，古文中常取其“有棱有角”意，如“其器廉以深”（《吕氏春秋·孟秋》）、“廉而铤”（《吕氏春秋·必己》）。这里的“廉”就是指的“有棱有角”，引申之就是“严格”、“刻板”、“一丝不苟”的意思。

“廉”在古典中国的语境中到底是如何呈现的呢？

汤将伐桀……克之。……汤又让于务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请相吾子。”务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非其义，不受其利；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于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乃负石而沈于蓐水。（《离俗》）

“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非其义，不受其利”——不正当得利就是“非廉”，这里的“廉”与现代汉语的意涵相通，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代人常把官员的“廉”理解为“廉洁”、“清廉”，也就是不贪污、不贪财。应当说，这是“廉”的本有之义。所谓贪财，就是用不符合行为规范的方式，也就是“不义”的方式来获得财富或物质利益。这里需要指出，现代汉语中“义”字演化出许多意涵。而在古典时代，“义”的本意就是“仪”，也就是人的行为规范和处世信条。^①在古典时代，“廉”与“义”是有内在关联的两个概念。“廉”指的是人对“义”严格遵守。我们都知道，趋乐避苦、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只要是人，都会本能地想生活得更好，有更好的物质享受。问题的关键是，人们的本能与“超我”（在某种意义上讲，“义”其实就是“超我”）相抵触时我们该作出怎样的选择。所以“拒绝不正当获利”、“不贪财”是“廉”的衍生义。“廉”的核心意涵指的是人对“义”（行为规范）的严格遵守，所以“廉”与“方”、“直”——“方正刚直”意义关联且经常互为说明，如老子的名言：“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②《吕氏春秋》本身也有不少这类表述，所谓“清廉洁直”（《贵公》），所谓“坚穷廉直忠敦”（《审分》），这些都表示“廉”之“刚直方正”义。

① 有关“义”的含义后面有详细论说。

② 《老子·第58章》。

《吕氏春秋》关于墨家言行的记载不少，能反映其行为风格的主要有下列四段。从《吕氏春秋》相关段落看，墨家的特点体现在为人处事的“廉”上，而在《墨子》书中所强调的“爱人之父如爱己父”之“兼爱”上。这些段落是在揭示的都是墨家对其“义”的严格遵守，也就是对其行为规范的一丝不苟、对其处世信条的毫不妥协，而这些正是“廉”字的本有之义。

其一，《高义》篇：

子墨子游公上过于越。公上过语墨子之义，越王说之，谓公上过曰：“子之师苟肯至越，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过往复于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观越王也，能听吾言、用吾道乎？”公上过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虽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虽全越以与我，吾无所用之。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国，是以义翟也。义翟何必越，虽于中国亦可。”

“道”即是“义”，从人的实践角度看叫做“义”，从形上的角度看就是“道”。墨子强调的是越王是否采纳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处世信条（义），“全越与我”这样的大利与这相比无足轻重。墨子真可谓“临大利而不易其义”者，这正是“廉”字的本义。这里的主旨与“兼爱”毫无关联。

其二，《上德》篇：

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

“一诺千金”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一直推崇的美德，“守信”在古典中国更是士子们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人人都必须遵守之“义”。只是在当时墨者这样的武士们看来，对人的许诺是需要用“生命”去履行的。墨者钜子孟胜非不知道“生”的可贵，但为了对“义”的坚持，他只好宁死不辞。正如《孟子》所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临大利而不易其义”是“廉”的本义，而“临大害而不易其义”同为“廉”的表现。

对人来说没有比失去生命更大的“害”了，但是，为了不玷污自己的“义”，舍弃生命也是值得的。正如《吕氏春秋·士节》对真正的“士”所作的评价：“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这里我们看到的仍是墨家风格之“廉”，而不是“兼爱天下”之“兼”。

这一段文字不见于今本《墨子》书中，这种以生命为代价来实现自己承诺的行为确与《墨子》书“兼爱”主题下的宽柔情怀搭不上边。值得指出的是，孟胜的死守阳城也与《墨子》书的另一重要观点“尚同”明显抵触。要知道，阳城君之封地是因其参与了吴起的事变被认定有罪而被楚国中央政权没收的。以《墨子》“尚同”的观点，孟胜们是应该毫不犹豫地响应楚国中央政权的命令，积极配合楚国中央政权对阳城的兼并。但显然孟胜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似乎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

其三，《去私》篇：

墨者有钜子腹䵍，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䵍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䵍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

这一段文字也不见于今本《墨子》书中。一个以“兼爱”为标志的团体，它的领袖却是一个大义灭亲的形象。这是过往的文论无法解释的。这恐怕也是今本《墨子》书没有吸收它的原因。如果我们转换一种思维，认定墨子“贵廉”的本质，则这样的疑惑就自然冰释了。对于古代武士来说，“义”就是“法”，“法”即是“义”，对“义”的坚持是压倒一切的。这一故事充分地表明了“贵廉”是墨家的标志，而与传统上所认定的“兼爱”毫无关联。

其四，《爱类》篇：

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公输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辍不攻宋。

《孟子·尽心上》中有云：“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似乎就是针对这个故事而发的议论。但严格说起来，“摩顶放踵而为之”这种自苦行为

与对天下的“兼爱”并无直接关联。为了一己之私，为了自己的家庭，或者为了小团体的利益，很多人就可以做到“摩顶放踵而为之”。这种情况历史和现实中都不乏见。上述故事的合理解释是：“救守”是墨家自己的主张，也是他们的处世信条。为了贯彻自己的“义”，即使再怎么困难也在所不辞，常人难以承受之牺牲也勇于承受。这也正是“廉”的应有之义。

总之，从《吕氏春秋》文本出发，“贵廉”而不是“贵兼”才是当时墨者的真实写照。

（二）陈骈应是贵“术”而不是贵“齐”

陈骈即田骈，这没有什么疑问。只是传统上大多以《庄子·天下》篇的“齐万物以为首”作为田骈的标志，认为田骈的思想主旨是所谓“齐生死、等古今”（《吕氏春秋》高诱注）。但这是《庄子》中的田骈，而不是《吕氏春秋》中的田骈。在《吕氏春秋》中，田骈共出场四次，无一表现出“齐生死、等古今”的出世意向。除《不二》篇中的“陈骈贵齐”外，《吕氏春秋》中《执一》、《用众》、《士容》篇中都有田骈出场。《执一》篇：

田骈以道术说齐，齐王应之曰：“寡人所有者，齐国也，愿闻齐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愿王之自取齐国之政也。”骈犹浅言之也，博言之，岂独齐国之政哉？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

《用众》篇：

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田骈谓齐王曰：“孟贲庶乎患术，而边境弗患。”楚、魏之王辞言不说，而境内已修备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众也。

《士容》篇：

客有见田骈者，被服中法，进退中度，趋翔闲雅，辞令逊敏。田骈听之毕而辞之。客出，田骈送之以目。弟子谓田骈曰：“客，士欤？”田骈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敛，士所术施也；士所弇敛，客所术施也。客殆

乎非士也。”

上述《执一》篇所记应该就是对田骈思想行为风格的一个十分到位的介绍。田骈所重视和提倡的是“道术”，简称“术”，也就是建立在掌握事物规律基础上的处理问题的方法。他要求人们透过事物的表面而抓住本质和规律，可见他是一个重视方式方法和工作效率的人。他的意思是，只要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做任何事都可以驾轻就熟，迎刃而解；把握了事物的规律，懂得了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小则“无政而可以有政”，大则“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术”似乎是田骈游说诸侯的本钱。

第二段中田骈同样强调的是“术”。此段历来注解都未得本真。问题出在对“孟贲庶乎患术，而边境弗患”的理解上，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这里的“患术”应指的是应付患难之术，也就是处理边境危难的方式方法，“庶”即与“正”、“嫡”相反意之“庶”。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当孟贲不像“患术”那样受到重视的时候，一个国家的边境就安定了。也就是说，当处理边境危机靠一套随时都可行的方法而不是寄托于个别勇士的时候，一个国家才会真的安全。可以看得出来，田骈这里的“患术”就是靠集体的力量，所谓“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这里田骈强调的也是“术”。

明白了前两节的含义，第三段也就不难理解了。田骈重视的是行之有效的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而不是说客本人的礼仪风度，而战国时期的真正智能之士往往是不修边幅，恃才傲物的。客人之所以不被田骈看好，原因就是该说客把“士”并不在意（所谓“弇敛”）的个人礼仪作为进身之“术”来施展；而田骈所期待的治国之方式方法——真正的“术”——客人却少有展现。这里田骈仍然关注的是“术”——治国的方式方法。

由上述可见，《吕氏春秋》中的田骈重视的是“术”，而不是“齐”。为什么《吕氏春秋·不二》篇说他的思想主旨是“贵齐”呢？笔者颇怀疑是由于语涉《执一》篇中“田骈以道术说齐”而误。另外，田骈强调合众人之力以抵御外侮的“患术”也使人有“贵齐”之想，《淮南子·说山训》中就有“力贵齐”之说。但不管怎么说，《吕氏春秋》中的田骈是一个充满了入世情怀、治国理想的纵横之士，绝没有高诱注中所说的“齐生死、等古今”和《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齐万物以为首”的出世思想。

（三）阳生似是贵“己”而不是贵“己”

甲

孟子说：“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①又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②《列子·杨朱》篇更有杨朱鼓吹穷奢极欲、放荡形骸的长篇议论，世人心目中的杨朱是一个只知口腹之欲和及时行乐的极端自私的形象。以此先入之见来看《吕氏春秋》中的杨子，于是就有了“阳生贵己”这一定说（“杨”与“阳”古通）。但是真正的学术精神需要我们从《吕氏春秋》文本本身来归纳确定“阳生”的思想主张。《吕氏春秋》中除了“阳生贵己”这一短语之外再没有其他记载阳生具体言行的文字，这给我们理解抽绎“阳生”的思想主旨增加了极大的困难。但是，在《吕氏春秋》文本所提供的语境中，我们看不出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种极端自私意义上的“贵己”的意涵，更没有丝毫鼓吹及时行乐，放荡形骸的倾向，这从《吕氏春秋》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的相关篇章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于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来解释“阳生贵己”这一定论呢？

笔者认为，问题或许出在“贵己”的“己”字上，从《吕氏春秋》文本来看，阳生所贵者应是“己”而不是“己”，两千年的一致认定极有可能源自一个字的误认。首先，《吕氏春秋》中有不少议论自我之“己”的章节，最典型是《先己》篇和《必己》篇，但这两篇中的故事和议论都与“贵己”的主旨相悖。前者宣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对领袖人物的要求。后者指出“外物不可必”，外在客观的东西往往很难称心如意，但主观愿望和意志却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握的。一个高尚的人不会太在意事情的结果是否会得偿所愿，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和出自这一良好愿望的切实行动。可以看出，吕子们这里所强调的不仅不是“自私”意义上的“贵己”，而更多的是为了实现理想所需要的自我牺牲式的“克己”。

问题的解决需借助《吕氏春秋》的《审己》篇和《重己》篇。传统上都以“己”来释读这两个篇题，特别是“重己”的认定更成了“阳生贵己”的直接证据。实则从《吕氏春秋》该篇的内容来看，这一篇的篇题更应该是“重己”而不是“重己”。一字之迷，遂成千古疑案。读者朋友肯定马上就会问，“己”是何意？“重己”应作何解呢？让我们放下《重己》篇，先来看看《审己》篇吧！此篇也常被误读为《审己》，但只要细细品味该篇内容，就不难明白，该篇的主

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孟子·尽心上》。

旨无疑应是“审已”。何为“审已”？“审”即审问、考究、弄清楚的意思。“已”即“以”，同音通假，古来有之。“以”作“依据、凭借”解。该字常与“故”字连用，我们常会用“以故”来代替“所以”。“故”的含义比较普通，就是“原因、原理、缘故”的意思。稍加分析，可以知道，“以”和“故”是一种意义贯通的能所关系，“以”是能依据者，“故”是所依据者。在整个汉语历史中，都可以看到“以”和“故”是可以互用的。今天的人们常会把“是故”与“是以”混用，在古籍中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我们既可在《论语》见到“是以”——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①也可以在《孟子》见到“是故”——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②《吕氏春秋》该篇的故事和议论都可以为证。

《吕氏春秋·审已》开篇就说：“凡物之然也，必有故。”一开始就指出该篇的主旨在于“故”，接着就说：“稼生于野而藏于仓，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并不是粮食自己想藏到仓库里去，而是人要依靠粮食才能生存，指出“以”之重要性，并马上用列子学射的例子来进一步论说“以”：

子列子常射中矣，请之于关尹子。关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请。关尹子曰：“子知子之所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独射也，国之存也，国之亡也，身之贤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所以。圣人不察存亡、贤不肖，而察其所所以也。

“以”——也就是对内依据和原理的凭借——不仅是学射的关键，也是万物得以成就的关键，是事物得以成立的内在理据和原理。紧跟着：

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所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所以欲岑鼎也，所以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所以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于是鲁君乃所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谓此能说矣。非独存己之国也，又能存鲁君之国。

① 《论语·子张第十九》。

② 《孟子·尽心下》。

柳下季之“信”是他之所以成名的“内在依据”，是他之所以为“柳下季”之“国”，柳下季本人成名“以”（凭借）的是他的“信”，鲁国之存亡和齐君之认可所“以”（凭借）的也都是他的“信”。

在下一个故事中，吕子们告诉我们的是，齐湣王正因为不知亡国之内在缘由——“故”，进而不知道怎样依据和应用——“以”，所以只好客死他乡了：

齐湣王亡居于卫，昼日步足，谓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当所已。”公玉丹答曰：“臣以王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所以亡也者，以贤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贤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所以过也。

这里的第二个“已”就是“以”假借的明证，惜乎各家训解对此都似是而非。“我当已”即是“我当以”，这一句话是我们解开阳生之谜的关键。齐湣王的意思是说，我如果知道我亡国的内在缘故，我就会凭借，就会借鉴；正因为 he 不知事物之“故”，所以“至死”也“不知所以亡”。

越王也因为不知所“以”，陷入同样的悲剧：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尽杀之，而为之。恶其三人而杀之矣。国人不说，大非上。又恶其一人而欲杀之，越王未之听。其子恐必死，因国人之欲逐豫，围王宫。越王太息曰：“余不听豫之言，所以罹此难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吕氏春秋·审己》通篇都在讲“以”、讲“故”，因而很明显，此篇的标题应是“审以”，因通假成“审己”。后人不知就里，因《吕氏春秋》中有《先己》《必己》的篇名，就想当然地认为此篇的篇名为《审己》，遂造成两千年的不解之谜。

乙

至于所谓《重己》的篇名，应该也是误认“重己”所致。此篇开始就说“倕，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玕，有之利故也”。连续两个“爱己”使人不由得认定该篇的篇名应是“重己”。但其实这两句话的重心却在之后两个“有之利故也”的“故”上。为什么人们都爱惜自己的手指和自己佩戴的“小玕珠”呢？

并不是我们不喜爱“至巧”的“捶之指”和“昆山之玉、江汉之珠”，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控、无法利用它们。人们的这种行为是有他们不得不如此的内在“缘故”的。我们前面讲过，“已”和“故”是可以贯通互用的，“重已”即是“重故”，“贵已”即是“贵故”。本篇论述的是“贵生”，强调“生命”可贵这一当时的共识，保有生命是所有其他价值成立的基础和出发点。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在依据和原理（故），“贵生”也需要弄清楚贵生之故。无知之士虽想“全生”，最后却落得个“害生”的结局，原因就在“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因为他们不知道“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的道理。从整篇出发，可以看出该篇的重心是提醒人们要按“性命之情”来“全生”、“贵生”，也就是要“养性”，因为“性命之情”是“生命”之“故”——生命的内在价值依据所在。

什么是“性命之情”呢？就是要长生久视。怎样长生久视呢？就是要“适欲”。“适欲”才能长生久视，所以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有它的依据和原理，理性的君子要知道分寸，要特别重视“已”。

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燂热。燂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鞅，中大鞅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官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醪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重已》）

需要指出的是，“已”与“因”不同。在《吕氏春秋》中，“因”基本上是指对外物的“因顺”，如《贵因》篇中所说：

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远涂也，崢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